

少城文史資料

成都市青羊區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少城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成都

前　　言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主席

严红飞

文史资料的征集、编纂、出版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部分。原西城区政协出版发行的《少城文史资料》1—3辑，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受到上级部门的嘉许！

今年春，政协青羊区首届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十分重视文史工作，并积极着手以新区地域历史文化条件编撰一集具有青羊特色的文史资料。关于“名称”问题，仍沿用“少城文史资料”之名，因为今日之青羊区仍然是成都古少城地域，文史资料冠以“少城”之名，体现区域特色，又富有鲜明的历史性。更表示我们新建的青羊区政协在原西城区政协文史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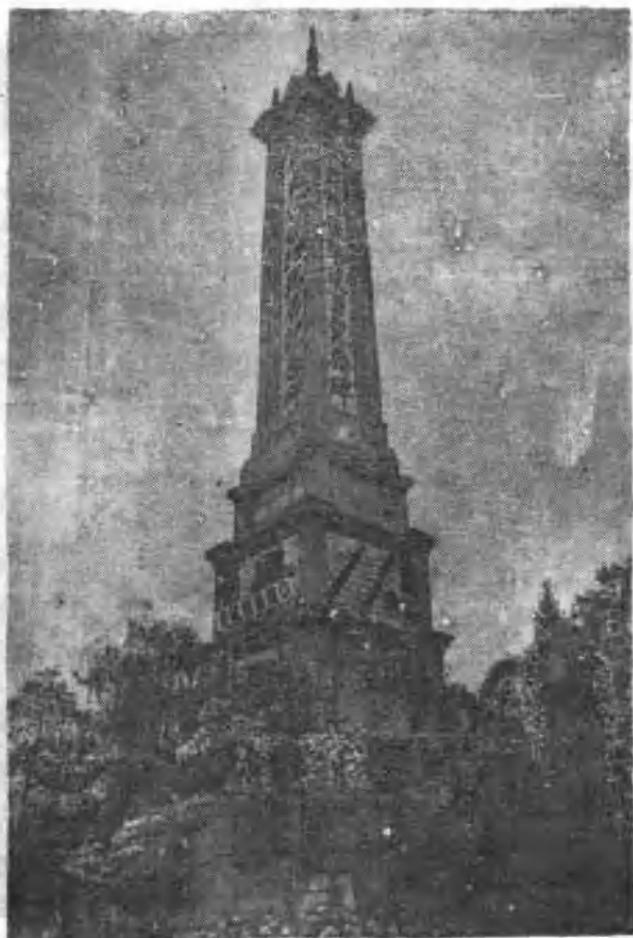
新区建立，百事待举。由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审组同志们的努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如期完成了第四辑《少城文史资料》的编撰任务，我对此表示谢意。

第四辑《少城文史资料》编印之时，正值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和平解放西藏40周年，因此，本辑尽力编撰了上述史料内容。全辑共18篇约10万字，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突出区情，必将激发人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感情，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为青羊区的崛起献计出力！

1991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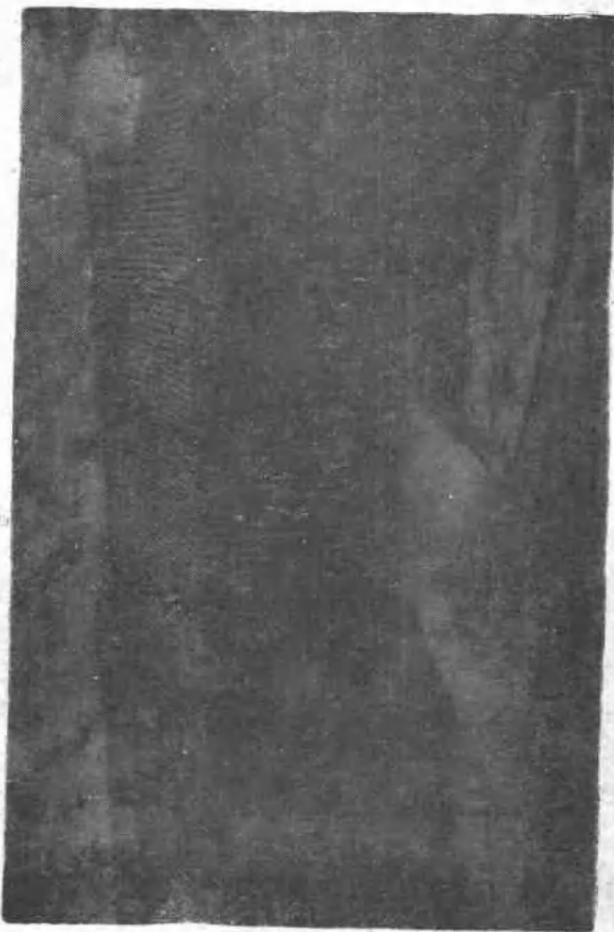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
王右木烈士



成都市市级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青羊区文管所摄)

成都市石室中学校门 (青羊区文管所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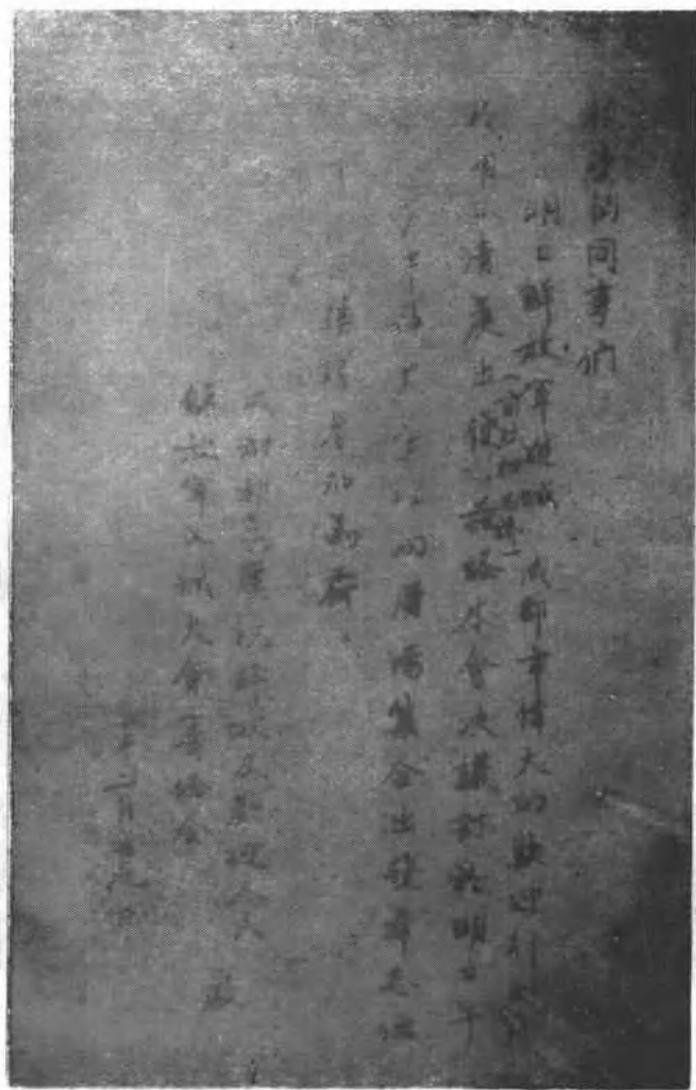
成都市少城中学老校门（少城中学供图）





成都市杜甫草堂内
浣花夫人塑像

(草堂博物馆 摄)



《成都邮政史话拾零》附图

“一张油印通知单”

附 录:

政协第一届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主任: 叶振文

副主任: 李参化 高蜀南

委员: 丁 浩 朱之彦 肖育忠 龚 得
曾成志 熊志敏

封面题字: 陶武先

封面设计: 宋拔天

主任编辑: 高蜀南

责任编辑: 游开国

参加本辑编审工作的同志有(按姓氏笔划):

朱之彦	李参化	杨政和
庞孝益	周少稷	徐稀星
龚 浠	曾成志	戴文鼎
熊志敏		

目 录

- 王右木在成都大坝巷 熊永康 (1)
略论辛亥革命的成败 李殿元 (15)
彭 (家珍) 大将军轶事 朱之彦 (24)
辛亥革命前后成都记事 李参化 (36)
进军西藏的片断回顾 徐稀星 (41)
少城中学的由来和发展 赵尔澄、张慎沅 (50)
石室中学前身的办学特色 张志英 (58)
浣花溪与浣花夫人 丁 浩 (68)
青羊宫花会忆旧 戴文鼎 (77)
鉴古观今话青羊 邓穆卿 (87)
光华村的变迁 徐寅先、戴文鼎 (90)
少城逸闻集锦 (一) 吴绍伯 (95)
成都市西城区四十年社会发展见闻录 孙光彬 (99)
冯玉祥将军在空军荣誉新村 熊志敏 (106)
忆孙震先生片断 刘同善 (111)
热心办实业的盛绍章先生 邱楣西 (116)
解放前的成都市长余中英生平事略 米庆云 (124)
成都邮政史话拾零 王大炜 (129)

王右木在成都大坝巷

熊永康

现今青羊区体育场路北侧，解放前叫大坝巷。六十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演出过可歌可泣的“活剧”。

这一幕幕“活剧”的主角，就是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

王右木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毕业于明治大学。1919年回到他家乡江油县，因向往救国，不愿听从大哥王初龄为他活动竞选省参议员的安排，大哥责其不肖，逼其分家，他便举家迁至成都大坝巷。整整五年，他一直住在大坝巷五号（即今省体委机关）直到他牺牲为止。

在大坝巷，他获得了“新生命”

早在日本求学期间，王右木就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神州学会”，参加过一些爱国活动。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有以‘德漠克拉西’学术思想自恃”的民主主义者。

1919年9月，他受聘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兼教授。他很希望发展教育，振兴国家。但那时政府为军阀控制，军阀扩军，财政日紧，政府便克扣教育经费，令教育难以维继。这使他感到，军阀拥兵干政，是国家得不到治理，教育得不到发展的祸根。于是，他一面在有关会议上为争取教育经费大声疾呼，一面刻印传单抨击军阀。

怎么改造社会？怎么废除军阀？王右木和全国志士都在寻找药方。当时，由于“俄战尚正封锁……真正改造途径，未得传来”，人们“未明顺应世界改造机会就应怎么办？”加上“世界各大资本家的报纸又大肆诱惑”，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自治宪法运动”热。中国各阶级也怀着各种目的，齐声呼唤“自治”，一时在全国范围形成“自治运动”。在四川，“自治”口号喊得最响的要算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半月》报。它创刊于1920年8月，1921年被警厅查封。它出过《自治问题专号》、《裁兵问题专号》。在《半月》报上，呼唤“自治”最力，并且敢于点名抨击军阀的，便是四川“五四”运动的猛将、高师进步学生袁诗莞。

由于王右木同袁诗莞当时政见一致，思想相近，因此，1921年1月，他们便以大坝巷五号为社址，创办《新四川旬刊》，宣传“自治”。他们提出“自治前提，首在裁兵”，甚至天真地“谱一方案”：“务期军官的大小与军队的多少，不生关系，然后将裁减的军队分期遣散归田”。尽管他们竭尽全力鼓吹“民治”，对军阀“痛下攻讦”，但军阀对他们的说教却无动于衷，仍然大搞“军治”、“官治”。王右木最后不得不承认：要求军阀“裁兵”，让民众“自治”，是“新四川报记者说梦话”，他劝读者“应勿仍迷信自治运动再会有望”，要“另求新计划”。

《新四川旬刊》鼓吹“自治”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军阀“痛下攻讦”是应肯定的。它于当年5月停刊。此后，王右木看到“社会更见污浊”，他说：“欲竭吾知识有所贡献”，但“久不知所从事”。

及后，他注意到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社”为一方，以研究系分子张东荪为代表的“改造社”为一方，正在

开展中国应不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他通过“积月攻研”，读了双方在“阅数百日”的辩论中写的“几及百余万”字的文章，又读了李达编译的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总论》，以及“广东共产党杂志”，从而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派别的思想界限。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立可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立可阻止军阀构兵”；“立可救济财政破产”；“可减轻人民痛苦”，可使“人民精神及物产生活渐次安固”；“可促进世界和平”。他无限振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比着他“今后的新生命”。

在大坝巷，他创办了《人声报》

王右木认为，引起他的“别择心”——从鼓吹“自治运动”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名贤之周详指导”的结果。他说：“但知天下人之中，迟疑不及我者，仍必不少。则陈（独秀）、李（达）、周（佛海）、费（觉天）等人之高论，我其可不因我新生命之确定，而本信心以介绍的吗？”

为了教育天下“不及我者”，他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进步青年成立“马克思读书会”；二是在大坝巷五号，创办了四川第一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人声》报。

1923年，他在写给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的信中说：“当时木曾于高师设一读书会，集合好读新书报者，合而一之，木以心得暗中指导，似有头绪。当创办《人声》十日刊，十日刊后改周刊，因学潮事停版。中间曾将高师校内部读书会，改为各校共通的读书会，取名为《人声》报附设者，其态殊仅集合学生及工人宣传，并非偏重学理研究及（即）向

各人脑中有效地输入也。四川争教育经费事起，木即投身于教职员联合会，以作攻击旧制度之宣传，读书会员刘度时充学生会理事……”。

这段话说明，王右木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治国良药后，便不倦地做传播工作。他从指导自己周围的进步青年学生做起，进而将读书会扩大到校外。他不偏重学理论研究，而注重联系实际，以之为武器，“作攻击旧制度的宣传”，并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革命骨干。读书会员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普遍发挥了骨干作用。会员刘度还成为冲锋陷阵的猛将。说明读书会既是进步青年的学习团体，又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政治组织作用。后来，读书会规模日益扩大，参加者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中小学教师及新闻记者，最盛时达百人以上。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创办的《人声》报。这张报纸于1922年2月7日创刊。它一创刊就在头版头条发表《本社宣言》，明确宣布它要“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布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对社会的政治组织，作一致的行动”等等，充分展示了王右木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紧接《本社宣言》之后，刊载了王右木写的《一年来自治运动之间顾与今后的新生命》。这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剖析产生自身经验教训及思想转变过程的好文章。这篇文章总结了当时“自治运动”的国际国内背景，指出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宪政运动”，同时揭露了中国军阀和资产阶级本质，指出不论在军阀或资产阶级统治下，都不可能改变中国“长夜昏黑，不见天日”的时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王右木在《本报创刊缘起》中说：本报决心“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倡前去，绝无无的放矢旁皇道左之态度。”他这种一往无前呼倡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创刊号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比如，袁诗莞（这时已毕业到南充教书）写的《红色的新年》，文字尖锐泼辣，痛骂军阀官僚，热烈歌颂“赤色化的发源地，实行劳农主义的新俄国”，响亮地提出：“打倒资本主义制度”，“打倒不劳而获的阶级”。这篇文章先投顺庆（南充）《民治报》没有发表。袁诗莞寄给王右木，王右木在发表时加编者按说：“……本报认为这篇文章实在也不过是些应该说的话，在号称言论自由的顺庆的明治报不能发表，竟鼓动本报不能不发表他——这篇文字——的好奇心了。所以新年早已过去了，本报仍是绝决的要把他发表出来。”

结果，这篇文章被警厅指责为“语极离奇”。警厅传询王右木，威胁说，若再涉“离奇”，就要停止《人声》出版。

针对反动派的刁难，王右木也在采取对策。如该2月2日出版的《人声》旬刊第三号被查禁后，王右木便于3月1日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一条启事。文中说：“本报第三号业由警厅命令停止出版，谓‘本号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谨向爱读本报诸君道歉，已订报者准于次期出版时补送。”这看似客观说明停报原因，实际在揭露警厅压制新闻自由的反动面目。它宣布“准于次期出版时补送”。说明《人声》并没有屈服，仍要“鼓吹社会主义”。

1924年4月，《人声》报在《地方通信》栏中揭露了驻防